

西方的战略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江 曼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EINE STRATEGIE
FÜR DEN WESTEN
HELMUT SCHMID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据西德勒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西方的战略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江 曼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插页2张 75,5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00册

ISBN 7—5011—0002—0/D·1

统一书号：3203·126 定价：0.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缺少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1)
何谓总战略.....	(3)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处境.....	(14)
欧洲的退位.....	(16)
苏俄稳定的总战略.....	(18)
第二章 欧洲的作用和问题	(22)
安全问题.....	(24)
经济问题.....	(31)
西欧的政治范畴.....	(37)
美国的主宰地位.....	(43)
第三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三个地区的问题 ...	(49)
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	(49)
中美洲.....	(58)

近东.....	(62)
远东.....	(70)
暂试总结.....	(76)
第四章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挑战.....	(78)
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	(78)
美国的赤字是定时炸弹.....	(82)
关于“世界经济首脑会议”.....	(91)
东西方贸易.....	(92)
第五章 意见一致和领导的决心.....	(95)
缺乏领导.....	(106)
第六章 对一种“最佳情况”的设想.....	(108)
跋.....	(美) 威廉·P·邦迪 (116)
本书产生的过程.....	(美) 威廉·F·福尔茨 (120)

第一章 缺少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本书主要阐述我从十五年国际政治活动经验里得出的一个中心论点，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单纯一国的战略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或者确切地说，在西方世界的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无论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大国，都不能仅仅靠本国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经济目标 and 政治目标，或者获得外部安全。

如果它们不协调安全政策，那么，即使它们采取联合行动，也不能达到它们的经济目标。仅仅通过防务或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它们也不能得到外部安全；它们必须同时协调它们的经济政策。

温德尔·威尔基在大约四十五年前写道：“不实行经济国际主义的政治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沙地上的房子，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军奋战而求得充分发展。”今天，他也

许还会补充说，不仅如此，而且反过来讲也是正确的（即共同的经济富裕也需要有高度的政治合作和相互支持），而且除此之外，这二者还必须有一项协调的安全政策。

小国长期以来一直很明白这种相互关联。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愈小，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强制性就愈大。这一点从比、荷、卢三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公国）的情况来看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无论它们之中的哪一国尝试单独行动，无疑都将遭到失败。布鲁塞尔、海牙或卢森堡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并且认为，哪怕只是考虑一下纯粹一国的经济政策或者纯粹一国的安全政策，那也是不合时宜的胡思乱想。

但是一个国家愈大，往往愈容易情不自禁地唱独角戏。戴高乐将军在法国防务政策上就是如此。而今天，每一个法国人（也包括共产党人）都知道，没有外国的帮助，法国就不能自卫。英国人根据本世纪他们自身的经验也知道，他们没有支援便不能自卫。然而，大多数英国人至今还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走自己的路是可能的，值得反复尝试的。这项政策迄今在英国造成三百五十万人失业，这比五十年前萧条开始之时还要多。

最易受这种单干诱惑的当然首推美国。单独行动的倾向从历史和心理上看根源于美国的孤立主义。这种倾向有时由于对盟国感到失望而益加滋长，有时则因美国力量无与伦比这样一种一帆风顺的意识而变本加厉。二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参议员詹·威廉·富布赖特为其所著的一本书题名就

是《炫耀力量》。

不管怎样，个别的西方国家要在纯粹一国的基础上获得成功，总归都是幻想。没有一个协商一致的、或确实被接受的总战略而想实现共同的政策，这种企图同样是梦幻泡影。

何谓总战略

我所说的“战略”一词是指什么呢？今天，几乎人人都声称有战略。对饮料业经销经理来说就是销售战略，对足球教练来说就是比赛战略，在美国叫做“比赛计划”。经济学家向自己的政府鼓吹经济战略，不言而喻，所有国家都有军事战略，而且三千年来就一直存在，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从军事含义上使用这个词。

为了避免这一词的不同意义相互混淆，我将依次谈谈对外政策、经济政策以及（从经典的意义来谈）军事战略。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三个方面最终都必然同属一个范畴，无论我们现在把这个范畴简单地称为国际关系，还是用高雅的说法把它称为当今世界的跨国结构。每个国家或每个国家集团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都必须协调一致。简言之，它们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总纲，我所说的总战略（即“Grand Strategy”），就是指这个总纲。

假如我没有弄错，那末“Grand Strategy”的概念是巴·亨利德尔·哈特在大约三十年前采用的。英国这位重要的

作家和思想家原本是军事战略分析家；其后，他把思路扩大到一般的外交政策方面，並得出结论：在一系列国家中，这两个政治领域若不是密不可分的，便是相互关联的。在他的《战略》一书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他的看法，美国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个例子相当可信。利德尔·哈特认为：“和平国家往往无意地惹出危险。危险一旦临头，它们又比好战国家更强烈地倾向于做出极端的决断。因为后者进行战争是受利欲驱使，一旦它们发现敌人过于强大，不能轻易战胜的时候，通常会较快地愿意停止战争。犹豫不决的出战者是出于感情冲动，並非经过权衡，因此往往会把一场战斗一直进行到残酷的终局。”

我觉得这个观察很好。利德尔·哈特所描写的战时国家的态度，也有助于说明和平时期美国政策的摇摆倾向。东西方进行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不明不暗的斗争”（约翰·菲·肯尼迪的说法），其斗争方式尤为如此。美国人往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找到干净、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且最好是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在提出战略防御倡议的背后，不是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态度吗？

我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谈到当前的其他问题，不过，首先我想回顾一下现代史，回顾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国家的历史。我认为，这段历史表现出四个相当鲜明的时期，在这四个时期，西方以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奉行形式很不相同的总战略。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西方总战略的第一个时期相当短暂，我认为这是同苏联合作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便企图同苏联进行广泛的合作，在旧金山成立了联合国。在布雷顿森林设计了国际货币体系。巴鲁克计划规定，苏联分享美国核研究和试制工作的成果——顺便说一句，这一建议也符合陆军部长亨利·刘·史汀生辞职时提出的要求。最后，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向苏联以及象联邦共和国这样的美国原先的敌人，提供经济援助。

这个时期，美国人很快就让他们的武装部队复员。斯大林不是这样。他既不接收巴鲁克计划，也不赞成参与马歇尔计划。相反，他为苏联的核武器库，不久以后为氢弹、最后为火箭和卫星埋下伏笔。他禁止他的东欧卫星国接受马歇尔计划。他试图干涉希腊，卡死柏林，并对它封锁一年之久。所有这些事件导致西方在哈里·杜鲁门的领导下，于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结成西方联盟。

可见，在那个短暂的第一个时期，西方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提议同各国合作，而苏联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出现了可以简称为冷战和军备竞赛的第二个时期。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任期内，这第二个时期形成了如下特点：在苏联周围组成一个全球性联盟体系。在军事方面，大规模核报复被

看作西方的战略。

与此同时，西方作出了种种自强的尝试。五十年代初曾试图建立一个欧洲防御联盟，结果失败了。一九五七年，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导致缔结罗马条约。综观过去三十年，这些努力总的说来是相当成功的。这些活动当时受到美国的鼓励。美国当年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居于完全主宰的地位，而美国的经济政策被普遍赞赏和接受。

但是，在这个冷战时期，西方战略的军事部分从来不是没有争议的。将近五十年代末，它也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我还记得一本名为《靠不住的喇叭》的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是美国军界一位杰出人物——当时刚刚退休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达·泰勒。泰勒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原子弹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吹响喇叭，那该怎么办？假如我们有种种顾忌而不能使用它，那又会怎么样？另一方会不会赢得这场冲突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肯定的；不能相信大规模报复计划；因此需要有另一种军事战略，另一种军事结构。

西方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已在他之前得出了这一结论，还有些人比他稍晚一些也谈到了这一点，即使他们不象泰勒将军那样坦率直言。不管怎样，西方政治家在五十年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一支有实力的德国军队的帮助，便不能保卫欧洲。这导致西德重新武装。分裂的德国的东部小半部分随即跟着进行武装。联邦共和国现在大约有五十万现役德国军人，经过动员，在四天或五天之内能够派一百三十万经过

训练的军人开赴战场。

为什么人们认为必须要有士兵同处于压倒优势的俄国士兵、坦克和火炮进行对抗呢？很清楚，就相互核威胁来说，苏联在此期间将会同美国持平。一九六一年达到高潮的柏林危机和一九六二年的导弹危机证明，这种看法多么符合实际。无论华盛顿还是莫斯科（还是各自的盟国或卫星国）都不愿意为柏林或古巴冒核战争风险——而它们是对的。

由于人们看到苏联和西方都有能力以核武器相互威胁而取得了均势，于是便产生一系列远远超出军事领域的更进一步的见解。一个延续了大约十年（从五十年代末到一九六七年）的重新估计时期引出了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许多人把它称为缓和时期，但我愿意把它叫做在有安全保障基础上合作的时期。

一九六二年，就在这个对力量对比重新估计时期的正当中，约翰·菲·肯尼迪总统在费城发表演讲。对此，在欧洲的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他谈到大西洋联盟的共同结构今后应当建立在两根支柱上——美国支柱和欧洲支柱。

由于日益看到核均势或力量均势已经实现，东西方之间举行了最初的军备控制谈判，並在一九六三年达成第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它结束了大气层的试验。五年后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它是由苏联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谈成的。以后全世界一大批国家参加了这一条约，它们郑重地承担不制造、不购买、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谋求获得核武器的义务。一九七二年由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得了

最大的突破，缔结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从条约上确定战略性洲际导弹限量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尤其是缔结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实际上禁止双方建立当时在技术上有可能的、防止对方战略性导弹的防御体系。

正式说来，西方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在一九六七年底已经开始。联盟的各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以便确定联盟的总战略目标。在当时的比利时外长皮埃尔·阿麦尔的主持下，委员会阐明了双管齐下的指导思想，北大西洋理事会后来把它作为决议接受了。一方面，阿麦尔报告阐明西方盟国决心通过共同的防务努力保证自身安全，以共同的防御能力使苏联不敢发动进攻，並指出这一决心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向苏联提议，在这个有保障的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合作，首先在军备控制方面通过共同商定的条约进行合作，然后也在经济交流方面进行合作。

这个双管齐下的总战略也导致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协定。这一协定使联邦共和国能够在维利·勃兰特任总理的时期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互不使用武力条约。虽然越南战争还在进行，而且欧洲人确切地说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但是，这些协定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反弹道导弹协定一样，还是缔结了。

尽管世界开始出现通货膨胀，这一切还是办到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在于美国为越南战争筹措军费。七十年代初，西方总战略的共同推动力安然无恙地顶住了布

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及美元同其他重要通货之间固定汇率崩溃的冲击。甚至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石油冲击，北美和西欧工业社会大规模失业开始以后，这个共同的总战略继续经受住了考验。一九七三年甚至还取得了巨大进步，当时，英国虽然略有一点半心半意，但毕竟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

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会议构成总战略的这个时期的高潮。包括苏联（作为欧洲国家）在内的几乎一切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和美国参加了会议。把它们列入欧洲国家行列，苏联没有提出异议。赫尔辛基是那个常常被人称作缓和的欧洲合作时期的顶点。顺便说一句，“缓和”一词早在一九六七年关于阿麦尔阐述的双管齐下总战略的决议中，已被北约的正式语汇采纳。如今某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他们错了——他们对现代史就是如此一知半解。

在赫尔辛基会议期间，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导致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粗暴屏弃支付结算制度。它们差不多全是西方工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势在必行。因此，在赫尔辛基会外顺便决定举行最重要的西方工业国关于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我可说是这一套作法的发明者。在赫尔辛基，我们毫无困难地说服了我们的英国盟友和我们的美国盟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随后不久又毫不费力地争取到了日本人参加。这样，使最重要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的尝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

而这是在世界经济包含着各种各样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做到的！一九七五年底，应吉斯卡尔的邀请，第一次经济首脑会议在朗布依埃举行。

这个旨在建立军事均势和合作的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在一九七六年之后不久就开始消失了。这有如下一系列原因：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扩张，越南共产党人在苏联人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最后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戏剧性的事态发展。美国对阿富汗事件作出反应，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欧洲国家中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土耳其参与抵制行动。在此期间，苏联在一九七七年初大规模装备西方称为SS—20的新型中程导弹。如同俄国远洋舰队的扩建一样，这很令人忧虑。

总而言之，一九七〇——一九七三年之间同苏联结成的条约网络，没有覆盖俄国可能采取扩张主义行动的全部地带，而他们利用了这一事实。这些条约涉及双边洲际核威胁，从地理上看，大体上限于欧洲（尤其是柏林），但不涉及（比如说）近东、非洲或中美洲。

这些事态发展，尤其是苏联以SS—20导弹扩充军备，导致西方在安全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对策，即：首先宣布将在欧洲陆地上进一步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然后在四年不见成效的谈判之后开始部署。由于部署潘兴导弹（虽然其数量比SS—20少得多），这一反应使苏联方面忧心忡忡。另外，一九八〇年后华盛顿的某些谈话也使苏联人不安，如关于西方必须占优势的说法（顺便说

一句，我们在欧洲同苏联人一样听得很清楚）。加之，美国的防务预算猛增。一九八三年以来关于星球大战（战略防御倡议计划）的信口开河的说法使苏联更为惶恐不安。

自七十年代后期起，我们处在总战略的第四个时期——也就是重新处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之中。可以说，我们以某种方式又回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我们曾一度经历过的第二个时期。此外，（凑巧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西欧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紧密合作，在一九八〇年以后先是由于德斯坦向密特朗交权，随后由于波恩政府更迭，而变得松弛下来。同一时期，第二次石油冲击打击了几乎一切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只有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例外，对它们的影响较小。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失业人数上升到可以同三十年代初和从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规模，而那在当时曾经产生希特勒夺权那样的灾难性社会政治后果。百分之二十的人失业的时候，失去政治理智的倾向就会在许多人身上滋长。

自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起作了各种同苏联缔结裁军协定的尝试。这种尝试之一产生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条约草案，它虽已草签，但从未批准。既然美国人不想批准，苏联人也不批准。目前在日内瓦作的努力可能获得积极结果。我认为它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机会。鉴于近十年的经验，这已是很高的了，但是，任何人都不能确有把握地预言结果如何。（这一估计是我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晤之前半年在耶鲁作出的，今天仍不需要作任何修改。）今天我们在欧洲仍然处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以及经济相当困难的时期。

我现在总结一下对苏总战略经过的四个时期：第一，尝试合作的时期；第二，冷战和军备竞赛的漫长时期；第三，以军事均势保证安全，伴以同俄国人谈判和合作的时期；第四，新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

从欧洲人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说，从杜鲁门政府直到肯尼迪政府终了的这段时期达到了西方共同总战略的最大限度。在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时代也是相当高度一致的，虽然这与其说是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特点，倒不如说是西方对苏关系的特点。对苏态度在一九六七年阿麦尔报告后高度一致，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五年（包括一九七五年）极为一致。此后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缓和越来越是个幻想，甚至是自欺欺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苏联人利用它来捞取好处的时期。与此相反，欧洲人把双重战略思想继续看作原则上是现实主义的、适当的。

因此自一九七七年起，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西方共同的总战略日益衰退。西方首脑会晤降格为纯粹电视新闻。美国要求盟国给予不合理的援助。例如，七十年代末要日本人和德国人把美国国民经济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泥潭中拔出来。美国单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贸易禁运，先是禁运粮食（十二个月后又予以取消），然后禁运建设天然气管道所需设备（三个月后又予以取消）——华盛顿干这一切事都没

有通知盟国政府，更不用说同它们磋商。

今天我们欧洲人对美国预算赤字的后果感到不安。欧洲人对高水平的实际利息（即从市场利息中扣除了通货膨胀率之后有实效的那种利息）极为担忧。这种实际利息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高的，也是欧洲近代经济史上最高的。其次，欧洲人也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安，因为它加强了那些要求对美国出口给予补贴或对美国进口进行限制的美国人的地位，使自由贸易更为削弱。今天真正自由的贸易还不及世界贸易的一半。大部分贸易要末得到出口补贴，要末受到保护主义的进口限制。再次，欧洲人对欧洲的存款、资本和信贷大量流入美国感到不安。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成了外国存款、外国资本的最大纯进口国，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弥补预算赤字。

这一切丝毫没有在盟国政府之间进行过见效的商谈，没有摆脱世界经济混乱的共同战略。（这一论断在西方五国财政部长会晤以后仍然有效。应美国之邀，这次会议于一九八五年秋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由于美国中央银行改变了政策，日本中央银行改变了对美元的干预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大大降低了——是否暂时地？——美元的汇率。）美国人认为，世界处于经济高涨时期，这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确，美国经济相当繁荣，但世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拉丁美洲适如其反，欧洲各国国民经济（概无例外）停滞不前，这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因于欧洲人不能负责的高实际利息。

即使在军事方面，盟国政府也不是相互和谐一致。欧洲